

史学新论

民国佛教徒对日本佛教徒的 抗日宣传研究*

明成满

【提要】在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许多佛教徒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对日本佛教徒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注重揭露日本侵华对世界和平及其本国的危害,分析日本必败的原因,指出和平共处是中日两国关系的光明大道,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本国政府的侵略行为,并批判了日本部分民众和佛教徒对本国侵略政策的盲从。这种宣传是近代宗教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亚太地区民间外交的开展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民国佛教徒 日本佛教徒 抗日宣传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18)06-0137-08

晚清至民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巨变和自身生存的需要,中国佛教开始了转型,积极从事服务于社会和人生的事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许多佛教徒摆脱一些佛教戒律的束缚,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佛教抗日救国思想,^①并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进行抗日宣传是民国佛教徒抗日救国实践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抗日宣传包括对国内民众的宣传、对日本佛教徒的宣传和对其它国家的宣传。关于对国内民众和其它国家的宣传,笔者另有专文研究^②,而对日本佛教徒的抗日宣传则未见有专文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利用已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③、《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④等民国佛教报刊史料丛书以及《太虚大师全书》^⑤等史料,对民国佛教徒面向日本佛教徒的抗日宣传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国时期佛教慈善公益研究”(15FZS057)的阶段性成果。

① 明成满:《民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思想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83~187页。

② 明成满:《民国僧侣在东南亚的抗日宣传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74~83页;明成满:《民国佛教徒在国内的抗日宣传研究》,未刊稿。

③ 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版。

④ 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以下简称《补编》),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⑤ 释太虚:《太虚大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

一、揭露日本侵华对世界和平及其本国的危害

民国佛教徒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不但破坏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且对其本国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 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民国佛教界人士指出，日本的侵华行为使其成为破坏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罪魁祸首。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浙江佛教联合会致电日本佛教徒称，“吾全世界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之佛子，同体一心，故非民族、国家可分隔，然贵国当局，此次纵其无明，贪嗔出兵，夺攘华北，挑衅各商埠，做破坏东亚或世界和平之戎首”，并强烈谴责了日军在此次事件中的残暴罪行，“大屠无抵抗之华军华民，杀盗淫妄，罪无不犯。致全华全世界皆以贵国为怨府，实为不慈不仁之极”。^①

民国佛教徒指出，日本的侵华行动将使其成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现代僧伽》杂志社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前，“第二次大战之世界大战，布置已定，惟少导火之线耳！不料贵国政府，不惜甘为破坏世界和平之罪人，世界大战之作俑者”。^②太虚法师认为，日本“强占我东北之辽、吉两省。……且强迫满人蒙人为傀儡而谎言独立。……亦即为逼令东亚以至南亚、全亚佛教民众入于自相屠杀之一途，将亚洲民族复兴的活路突然堵塞，亦将世界和平之基础忽尔摧坏”。^③

宽道法师指出，日本乘中国政府忙于应付史无前例的大水灾之际，侵占中国东北地区，这种行为将使“人类惨剧恐将再演于同文同种之邻邦，……或将断送共存共荣之东亚”。^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佛教会向日本佛教徒指出，“从九一八到今天我们两大民族中间，摆着一串血腥的事实。这些事实，破坏了我们千余年来的友谊，破坏了我们文化合作的关系。破坏了东亚的和平，破坏了世界的和平”。^⑤

(二) 侵华政策给日本本国造成深重的灾难

中国佛教会指出，日本“军备不断地扩张，造成大众生活之不安，社会经济之恐慌，民族道德文化之损失，尤其是，最可痛心的一批一批纯洁之青年，受黩武主义的麻醉，被派到我们的领土上来，以疯狂的姿态，执行所谓‘光荣的使命’”。^⑥德馨居士认为，当中日战争进行到“中国筋疲力尽时，相信日本也山穷水尽了。结果两败俱伤，使强者坐收渔人之利”。^⑦太虚法师更是明确指出，中日之间相持不下的战争“引欧美各国相率来此东亚以作战场，发生二次世界战争，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⑧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佛教界就向日本佛教徒宣传，日本的侵略政策必将导致其亡国。《现代僧伽》杂志社指出，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对于其本国“无一利而有百害！远则足以灭亡三岛而有余，近则帝国亦将瓦解，而蹈德意志之覆辙”。^⑨太虚法师清醒地认识到，由日本挑起的中日之间的战争，“将历十年廿年而不可已。戎首既为日本，结果非陷日本于灭亡不可”。^⑩七七事变发生后，太

① 浙江佛教联合会：《电日本佛教联合会》，《佛化旬刊》总第116期，1928年6月，第5页；《集成》第17卷，第559页。

② 《现代僧伽》杂志社：《告日本佛教徒书》，《现代僧伽》第4卷第3期，1941年10月，第1页；《集成》第67卷，第109页。

③ 释太虚：《为沈阳事件告中国台湾地区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503~504页。

④ 释宽道：《告日本全国佛教徒》，《海潮音》第13卷第1号，1932年1月，第15页；《集成》第180卷，第119页。

⑤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徒书》，《佛教月刊》第8年第1期，1938年1月，第9页；《集成》第59卷，第475页。

⑥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徒书》，《佛教月刊》第8年第1期，1938年1月，第9页；《集成》第59卷，第475页。

⑦ 德馨：《告日本佛教徒》，《佛教月刊》第7年第9期，1937年8月，第2页；《集成》第59卷，第420页。

⑧ 释太虚：《为沈阳事件告中国台湾地区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504页。

⑨ 《现代僧伽》杂志社：《告日本佛教徒书》，《现代僧伽》第4卷第3期，1941年10月，第1页；《集成》第67卷，第109页。

⑩ 释太虚：《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507页。

虚法师指出，“恒中日冲突已达危迫之极点，将陷中日民族于数载数十载相争相杀，卒致日本自杀，遗地球至惨之祸”。^①太虚法师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的1940年，更明确向日本佛教徒指出日本必然灭亡的命运，日本侵华近三十二个月来，“已消耗尽数十年来所积蓄的物力人力，仍得不到一点可以安定下来徐图苏息的征兆。……若循现势下去，不速自救，则未有等待崩溃的到来而自杀身亡了”。^②后来形势的发展正如太虚法师所预料，日本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最后战败投降。

二、分析日本必败的原因

中国佛教界在对日本佛教界的宣传中，明确指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观点不是凭空得出的，而是佛教界人士在全面分析多方面的形势后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日本必败的原因如下。

（一）日本军阀对形势的误判

太虚法师认为，“日本军阀为贪慢痴心所蔽，浅见短视，妄以为历史上少数的蒙古人和满清人曾用兵力及汉奸灭亡过中国，错认优势的日军，并利用汉奸的傀儡组织，便可征服今日的中国，却忘了近代的中国，有英美法俄等复杂国际关系支持着，且清季以来中国民族的自救运动，已到了精力弥漫高涨的时代，万非孤单崩溃的宋末明末之时可比”。^③

象贤法师认为，日本军阀对形势的误判体现在错用了“国家主义”这一思潮。国家主义“在一个国家本身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是可以适用的”，但是日本作为一个早已统一的国家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帜，不惜牺牲自己国内外良好国民的生命，以满足其少数野心家的愿望，必定没有好的结果。“不但日本是如此，凡是国家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迟早恐怕是免不了同一个命运。”^④

仁心法师更指出，日本军阀对形势的误判还体现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国人不全是羔羊任你强暴宰杀而不知反抗，数年来让之又让，忍之又忍，实为爱护世界和平、保持东亚幸福、不忍同种相残陷两民族于悲惨的境地！而今忍让已到最后关头，和平无复希望了！大军压境，逼中国为城下之盟，中国纵极度无能，亦得领率健儿和你一拼。”^⑤

（二）中国是大国，日本难以灭亡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太虚法师就认为，“英较日强盛十倍，因一甘地之反抗，尚无术施高压手段于殖民地之印度，今以人众地大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岂甘为日本所征服？”^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之间的战争势必进入相持的状态，中国“利其交通不便，使新战器失其效用，兵连祸结，相持不下”。^⑦

中国佛教界人士还认识到日本的经济难以支撑长期战争，如太虚法师对日本经济就有清醒的认识：“日本为后起之工业国，粮食材料既多仰给中国，且环顾全球，亦更无销售日本商品之市场。……半年一载之后，兵力势必随经济力而蹶竭。”^⑧兵力受挫后，国内民怨沸腾，民众运动兴起，日本帝国就有倾覆的危险。

（三）国际社会不会坐视日本灭亡中国

对于国际形势非常了解的太虚法师认为国际社会不会坐视日本灭亡中国。他指出，中美苏三国

① 释太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512页。

② 释太虚：《告日本佛教徒书》，《人间佛教》1940年第7期，第3页；《补编》第67卷，第3页。

③ 释太虚：《告日本佛教徒书》，《人间佛教》1940年第7期，第4页；《补编》第67卷，第4页。

④ 释象贤：《日本佛教徒应一致觉悟起来》，《现代佛教》第5卷第3期，1932年3月，第199~200页；《集成》第67卷，第501~502页。

⑤ 释仁心：《告日本佛教大众》，《海潮音》第18卷第8号，1937年8月，第2页；《集成》第197卷，第238页。

⑥ 释太虚：《太虚致书日本佛徒请促军政财阀觉悟》，《威音》第35期，1931年11月，第3页；《集成》第35卷，第507页。

⑦ 释太虚：《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251页。

⑧ 释太虚：《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251~252页。

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的可能性非常大。假如中美苏三国联合，必能置日本于死地。因为不甘心日本独霸中国市场，担心中国会加入第三国际，美国肯定会牵制日本，其“海空军既足制服日本而有余，中国之陆军亦必可抵抗日本之陆军”。^①从联苏的角度来说，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有很深的渊源，联苏的可能性也很大。后来形势的发展正如太虚法师所预料的那样，中美苏等国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日本在这个同盟的打击之下逐渐走向败亡。

（四）因果循环报应规律不会让日本猖狂很久

中国佛教徒还用因果报应的理论指出日本必然失败。浙江佛教联合会认为日本数年前发生的地震，“为全世界空前之浩劫，其余风雪之灾，亦甚于他处，是皆恶业感召所致”。该会指出，“佛教首重感化，故使一切众生忏悔恶业，断除恶行，尤为要端。近来贵国出兵山东，无故残杀我多数军民，此等强暴举动，非但世界公理所不许，造此凶横之恶业，必受重大之恶报。”^②

三、指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民国佛教界人士认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在日本停止侵略并退还侵占中国的权益的前提下实现和平，两国实现和平对两国自身、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实现意义重大，并指明了两国实现和平的路径。

（一）中日实现和平的作用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中国佛教界人士指出，中日间实现和平对中日两国、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的益处。

首先，中日实现和平对两国的发展大有裨益。太虚法师认为，日本与中国联合，在经济上进行合作，可以开发中国的丰富资源，日本工业发展可获得原料，商品可销售于中国的市场，日本人到中国移民，可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太虚法师乐观地估计，如果中日间实现联合，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可收复香港等遗地”，“中日可援英荷属南洋群岛，及朝鲜、缅甸、暹罗、安南而成立为自由联盟国家，更由中日扶助印度、锡兰成立联邦共和国”，在这个国家群体中，“以佛教为联络贯穿之总神经，此种人间乐园，岂不即可实现”？^③

其次，中日和平能使日本成为亚洲复兴的盟主。青年佛学会指出，假如日本能立刻“与欧蛮之帝国主义断绝关系，撤回华北之兵，解除吾国之不平等条约，退还侵占吾国之特殊利益，进而援助吾国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的成功，又进而援助印度及南洋群岛皆脱欧蛮帝国主义之羁绊，则执牛耳者必为东南亚之佛化……贵国自为亚洲复兴之盟主”。^④

再次，中日和平有助于亚洲实现复兴。太虚法师认为，佛法是亚洲各民族文化的总线索，以之复兴亚洲的民族文化，复兴亚洲的民族国家，可收到良好之成效。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信奉佛教的两个最主要国家，只有中日间实现和平，才能达到以佛教振兴亚洲的目的。^⑤

最后，中日和平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实现。中国佛教会认为，中日间保持和平不仅关系到亚洲的和平，还对世界和平有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说明欧

① 释太虚：《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海潮音》第13卷第5号，1932年5月，第24页；《集成》第180卷，第492页。

② 浙江佛教联合会：《浙江佛教联合会致日本佛教团体电》，《海潮音》第9年第5期，1928年6月，第1页；《集成》第170卷，第318页。

③ 释太虚：《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254页。

④ 青年佛学会：《告日本佛教徒书——为日本出兵华北事》，《海潮音》第8年第8期，1927年9月，第2页；《集成》第168卷，第334页。

⑤ 释太虚：《为日本侵华问题告台韩日四千万佛教民众书》，《佛化随刊》第18期，1931年12月，第1页；《集成》第28卷，第309页。

洲文明陷入全体崩溃与末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文化应该为国际和平、世界大同局面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佛教会指出，如果中日间能实现和平，就会“使西方民族知我东方文化果足为长治久安之保障，则关系于世界文化之趋势及人类之幸福者其重大为如何。东方民族之责任在此，我佛教徒之责任亦在此”。^①

（二）中日实现和平的路径

民国佛教界人士指出，佛教文化是中日间实现和平的重要纽带。青年佛学会认为，中国和日本“不但洲同其亚，种同其黄，且文教风化之同，亦千百载于是。而贵国与吾国文化之同，强半因缘佛教。故贵国通俗所用之和文，亦由留学我国佛教之空海大师所造，今贵国人民多数为佛徒，吾国人民亦然，前岁东亚佛教之大会，吾国佛徒团之赴会，深念贵国佛徒及朝野人士，犹未失千百年来文化风教相同之情感”。^② 仁心法师从同文同种的角度说明了中日实现和平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从地理关系上说，从历史友谊上说，从国民幸福和国际利害上说，这两个国家无论如何应该合作以求共存共荣，纵有利害冲突之处，亦当权衡轻重，互求相让而复归于和好”。^③

民国佛教界人士还认为，西方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学说是导致近代战争频发的原因之一。中国和日本应该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为主导，实现中日间的和平，以维持人类之和平，这是东方文化的责任，也是东方民族的责任。^④ 太虚法师认为，“日本民族有爱护其民族文化的心念，日本佛教徒更有圣德太子建立的国家和文化”，用日本传统的民族文化能够“唤醒全日本的人民，共同起来要求撤退侵入中国的军队，回复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前的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将使日本民族保存千百年之文化历史于将来悠久绵延不绝”。^⑤

四、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侵略行为

为了争取和平，中国佛教界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佛教徒的争取，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佛教会和太虚法师等名僧都通过发表宣言和通电的方式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其本国军阀的侵略行为。这些宣言和通电的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日本佛教界具有唤醒政府的便利条件

宽道法师指出，日本佛教徒“厕身军政大有其人。非我国佛教徒侧重砥砺梵修、不预政治者之可比，能根据教义，唤醒政府，幡然改图，立循正轨，化干戈为玉帛，进世界于大同”。^⑥ 太虚法师认为，“日本佛教多优秀之士，且人民过半数为佛教徒，此正宜大启慈心慧眼，以之自救救人时矣”。^⑦ 中国佛教会认为，日本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相信你们在时局上能做一部分挽救工作。贵国佛教徒以研究佛学著名于当世，自能本所学我佛慈悲救世的精神，见诸实行”。^⑧

①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会重要宣言》，《四川佛教月刊》总第12期，1932年4月，第11页；《集成》第57卷，第239页。

② 青年佛学会：《告日本佛教徒书——为日本出兵华北事》，《海潮音》第8年第8期，1927年9月，第1页；《集成》第168卷，第333页。

③ 释仁心：《告日本佛教大众》，《海潮音》第18卷第8号，1937年8月，第2页；《集成》第197卷，第238页。

④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会重要宣言》，《四川佛教月刊》总第12期，1932年4月，第742页；《集成》第57卷，第238页。

⑤ 释太虚：《告日本佛教徒书》，《人间佛教》1940年第7期，第4页；《补编》第67卷，第4页。

⑥ 释宽道：《告日本全国佛教徒》，《海潮音》第13年第1期，1932年1月，第15页；《集成》第180卷，第119页。

⑦ 释太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512页。

⑧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徒书》，《佛教月刊》第8年第1期，1938年1月，第10页；《集成》第59卷，第476页。

(二) 呼吁日本佛教界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太虚法师指出，“日本之三千余万佛教徒众，为救世之大勇故，为恤邻之大仁故，为自拔之大智故，应联合起来，表示大雄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忠告日本主犯中国之军政军阀迅速停止侵略中国之行动，这样就可改造帝国主义。”^①太虚法师还进一步号召台韩日地区四千万信佛民众，“应速速成为一大联合，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精神，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业，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动，如劝阻而不听从，则进而与东亚、南亚以及全球之佛教徒联合，组织成佛教之国际，以联合振兴亚洲各民族皆获平等自由为职志，亦以联合世界上平等相待各民族实现永久和平为归趣”。^②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法舫法师希望日本青年佛教徒，以佛陀的名义，用佛陀的方法，感化日本军阀，消灭以武力形成的不太平的现象。“希望日本青年佛教徒，以佛陀平等大悲之精神，行自救救世之道，不帮助日本政府之侵略政策，以助长日军正在太平洋制造危机，应以佛教之本怀，济化日本之恶行，取信于各国佛教徒。”^③中国佛教会常务主席圆瑛法师希望日本佛教徒“注意努力，各出广长之舌，相共奋无谓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遵守国联之议案，撤退免伤两国之邦交，免招两国之公愤，免坏东亚及世界之和平”。^④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佛教会号召日本佛教徒应担起佛教徒的责任，“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抱自觉觉他的精神，放狮子吼，出大雷音，唤醒一般迷信黷武主义者，联合大众的力量，制止少数军人危险的行动，我们等待你们握手，共同努力于国际仇恨及不平等事件之铲除”。^⑤

(三) 批判日本部分民众和佛教徒对侵略政策的盲从

中国佛教徒在尽力争取日本佛教徒的同时，对日本部分佛教徒和民众盲从政府侵略政策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日本佛教联合会致电太虚法师，歪曲事实真相，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善待在华日僧才导致中日之间军事冲突，中日之间实现和平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停止抗日行动。太虚接到此信后，义愤填膺，立刻撰写《致日本佛教联合会书》，批评日本佛教界偏袒日本军国主义、为其侵略行为辩解的言论。^⑥宽道法师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佛教徒的麻木不仁进行了批评，“身荷如来使命，教化众生、引人入胜之贵国佛教徒，未闻促请政府改弦易辙之表示，殊欠佛徒感化之精神……倘能根据教义，唤醒政府，幡然改图，立循正轨，化干戈为玉帛，进世界于大同，则贵国之佛教徒，犹不愧为如来忠实之弟子。可告无罪于世人，否则阳标佛教立国之名，阴行侵略之实”。^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佛教会对日本国内部分狂热的民众进行了批评，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军人的盲动是重要原因，“但意想不到贵国人民会举国若狂，一致的表示拥护赞助。这种盲从的举动，逼迫敝国人民不能不放弃最后的容忍，事实发展，必然地会使人类遭逢更严重的危难，而贵国亦将不可避免受因果律的支配”。^⑧宽道法师认为，由于日本部分佛教徒观念上的错误，他们口头上宣称推进大亚细亚文化主义，好像努力佛教和平精神的事业，实际上喘息在帝国主义的权势之下，而且甘愿地为其爪牙。法铎法师对日本佛教徒纵容本国军阀侵略中国的态度猛烈批判，指出

① 释太虚：《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507页。

② 释太虚：《为日本侵华问题告台韩日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505页。

③ 释法舫：《评第二届太平洋佛教青年会》，《正信》第4卷第4期，1934年6月，第2页；《集成》第61卷，第264页。

④ 中国佛教会：《本会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请唤醒国民条陈政府制止对华军事行动由》，《中国佛教会月刊》1932年第28、29、30期合刊，第3页；《补编》第28卷，第184页。

⑤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徒书》，《佛教月刊》第8年第1期，1938年1月，第10页；《集成》第59卷，第476页。

⑥ 释太虚：《致日本佛教联合会书》，《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第508页。

⑦ 释宽道：《告日本全国佛教徒》，《海潮音》第13卷第1号，1932年1月，第15页；《集成》第180卷，第119页。

⑧ 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会致日本佛教徒书》，《佛教月刊》第8年第1期，1938年1月，第10页；《集成》第59卷，第476页。

“现在日本的政策携着大炮飞机的礼物向着中国土地人民轰炸，不但听不到普通佛教徒提着佛教正义来向自己政府抗议，即便最高知识阶层的佛教徒，也好像能心安理得过着自己的知识生活，我又觉得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耻辱，而且是一般人真的怀疑到佛教与人类到底有什么益处？这简直是整个佛教的耻辱”。^①

五、本文对民国佛教徒抗日宣传的评价

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民国佛教徒积极进行抗日宣传。虽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国佛教徒针对日本佛教徒的抗日宣传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但仍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对此我们应有以下认识。

（一）展现了中国佛教界的远见卓识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看出，太虚法师等人在对日本佛教徒的宣传中，体现了令人钦佩的远见卓识。

如前所述，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宽道法师就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动破坏了东亚和世界和平，会导致世界战争的爆发。这一预见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首先，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东亚格局的变化，英美的绥靖政策导致日本军力的急剧膨胀，九一八事变在二战进程中具有“蝴蝶效应”的起始性意义。其次，九一八事变后仅过了两个月，日本开始摒弃“协调外交”，转而推行“自主外交”，与英国、美国和苏联在东亚地区及西太平洋广阔的海域中，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拉锯战，由此开始打破“华盛顿体系”相对稳定的局面。因此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在国际关系演变中具有转折性意义。再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有计划、有组织和有预谋地实施“大东亚新秩序”战略。在此过程中，英、美、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日本的战争中，最终与中国形成了反法西斯同盟，新的国际体系处在孕育之中。因此，九一八事变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对于国际体系的变更具有过渡性的意义。最后，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从九一八事变到英法对德宣战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②此外，民国佛教界人士对日本必然战败及战败原因的分析都很精准，这些都体现了民国佛教界人士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能力和由此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

（二）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

佛教徒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对日本佛教徒的抗日宣传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贡献，在抗战胜利后其合法地位得到保障。“抗战以前，中国的政治不上轨道，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事第一，佛教命运不佳，偏偏在漫漫长夜中走着这两步霉运了，好像谁也不需要负责”。僧尼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胜利的共同光荣也是有分的，唯愿今后的中国政治中将没有摧残佛教的事件发生了”。^③佛教在国内政治地位的提高，还体现在佛教界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信教自由的提案受到很大的重视。此提案包括四部分内容：一、对边远区域及侨居海外之宗教民族，亦随时设法慰问保护之，俾情感相连，心志内邻。二、对不同宗教民族生命财产，务须一律依据法律平等保障之，取消单独对内地寺庙之管理条例。三、人民对宗教寺院布施之财产物品，应严禁地方政府机关侵占没收。四、各宗教寺院出资设立学校医院，举办慈善事业者，应令各地方政府一律保护之，惟不得强迫其担任出资兴办上述各项事宜。^④

（三）对当代佛教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

宗教作为人类对彼岸世界构想的体系化意识形态与思维结构，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

^① 释法铎：《从日本的侵略说到佛教的耻辱》，《海潮音》第19卷第1号，1938年1月，第4页；《集成》第198卷，第62页。

^② 苏太华：《论“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起点的合理性》，《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90~92，96页；王维远、徐建东：《论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日本研究》1986年第1期，第47~49页。

^③ 广文：《从佛教立场上分析胜利的意义》，《海潮音》第26卷第11期，1945年11月；《集成》第202卷，第217页。

^④ 《海潮音》编辑部：《参政会维护宗教提案》，《海潮音》第26卷第11期，1945年11月；《集成》第202卷，第233页。

单纯就其价值体系来看,一些宗教是引导人类向善的,并将近乎相同的真、善、美与和平思想作为各自宗教体系的终极信仰。在人类各大宗教的教义中,和平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在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内各大宗教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与国外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开展宗教外交,取得了重要成果。民国佛教徒对国外地区的抗日宣传便是近代宗教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亚太地区民间外交的开展有借鉴价值。

佛教由清末民初存在生存危机发展到抗战后地位空前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与时代同呼吸、与国家民族共命运,与社会的需要相适应。在当今时代,佛教应与其它社会团体一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例如,当今佛教应进一步发扬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大力兴办慈善公益事业。佛教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可以对自身的伦理体系进行充实、提高和升华,使佛教与时俱进,发挥更重要的社会作用。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当代中国佛教完全可以有针对性地重点强调和弘扬。同样,对于民主、文明、法治这些当代中国亿万人民追求的,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价值理想,应该充实和升华为佛教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总之,佛教既要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贡献力量,又要实现自身的变革和发展,使佛教更好地与当代社会相适应。^①

本文作者:历史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龚赛红

The Advocacy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Buddhis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mong the Japanese Buddhists

Ming Chengman

Abstract: In 1930s, Japanese imperialism gradually expanded the aggression into China. At the crucial moment of the nation, many Buddhists devoted to the career of resisting Japanese invaders and saving the nation, so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advocacy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mong the Japanese Buddhists. They exposed the harmful effects of Japanese aggression on world peace and Japan,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inevitable failure of Japanese invad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China and Japan is the right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lled on the Japanese Buddhists to stop the aggression of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criticized the blind obedience of some Japanese and Buddhists for the country's aggression policy. Their advoca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religious diplomacy, and has a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folk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Keywords: Buddhis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Japanese Buddhists; advocacy for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① 魏道儒:《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宗教》2013年第11期,第29~31页。